

致永遠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任

吳宇凡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助理教授

編按：本館前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任汪雁秋女士於今（114）年 3 月 17 日逝世，本館為感謝其於任職期間之貢獻，特邀曾為她進行口述訪談之淡江大學吳宇凡教授摘錄撰文，以表敬意。

一、引言

汪雁秋女士（1932-2025），出生於安徽省寧國縣，原籍安徽桐城，中農之家，成長於動盪的年代。1949 年隨著父親、家人輾轉來到臺灣。在完成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後，進入美國華盛頓卅立大學語文學系就讀並於 1961 年完成學業，同年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1995 年後更名為國家圖書館）任職。自 1961 年以來，汪雁秋女士從擔任館長英

文秘書到國際交換處主任，前後達 37 年，歷經蔣復璁、屈萬里、包遵彭、李志鍾、諸家駿、王振鵠、楊崇森、曾濟群等 8 任館長，鮑幼玉、謝又華、宋建成等 3 位代理館長，在工作上不僅確立了中央圖書館遷臺復館後進行國際交換的政策與定位，見證近代圖書館產、官、學界之各方面發展，對圖書館成為我國與世界各國、兩岸三地交流之樞紐，影響深遠。為感念其於我國圖書館界之貢獻，以下摘錄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長青會員委員會「退休館員訪問計畫工作小組」訪問稿中，有關汪雁秋女士入職圖書館、畢生致力於出版品國際交換及參與國際書展內容，以緬懷其一生的國家圖書館情緣。



汪雁秋女士接受訪談時剪影（2016年8月18日）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長青會員委員會「退休館員訪問計畫工作小組」



汪雁秋女士（中）接受訪談時剪影（2017年2月15日）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長青會員委員會「退休館員訪問計畫工作小組」

二、學成歸國後與中央圖書館的邂逅

汪雁秋女士：

1961 年畢業之後，當時教育部設有留學生輔導委員會，我請他們幫我介紹工作，結果留學生輔導委員會的人就說，「妳學英文啊！那正好！中央圖書館蔣館長正在找一個有英文背景的人，妳到圖書館去好了！」。留學生輔導委員會的主任叫做張仁家，我們稱他為留學生之父，他很慈祥，聽完我的話後就幫我寫了封信說：「妳到圖書館！」。當時我心裡想著我到圖書館要做什麼？我對圖書館完全陌生，而且我完全不知道在圖書館要做什麼事情，但轉念一想，在圖書館工作其實也還不錯，所以我就拿著他的介紹信去見蔣館長。

第一次到圖書館見蔣館長，蔣館長穿著一件白色的唐裝格衫，說話聲音很小，我也不知道他要講什麼，只聽到他說：「我圖書館需要一位學英文的，妳來得正好！」說完就要我到人事室去報到，那時正值七月初，我想先休息一陣子，不能馬上上班，七月十五日再報到，蔣館長應允了，就這樣確定入職中央圖書館。

入職後蔣館長讓我擔任翻譯，當時臺灣有個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臺北辦事處，贊助我們出版新書摘要，所謂新書摘要就是介紹每一本書，但除了中文以外，還需要用英文來翻譯，我是負責這項工作。亞洲基金會的任務主要在支援大學研究計畫，除了贈書之外，也支援我們出版；當時亞洲基金會支援出版的項目有 3 個，一個是新書目錄，其次是《中華民國學術機構錄》，再者則是學術研究，總共 3 種，支援兩年。

那時就編這 3 種書，兩年後新書目錄等書就停了，但是學術機構錄之後都是由中央圖書館

自己編輯出版。那時候還要處理蔣館長的英文信件，人坐在編目組，結果常常要寫信被喊到館長室，館長覺得很不方便，就把我調到館長室，我就轉職成為了他的英文秘書，做了兩年。原本國際交換處的主任是一位神父，叫作李貴良，在輔仁大學教書，李神父後來辭去行政工作要去傳教，他的位置出缺，蔣館長就把我調到交換處，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做到民國 87 年 2 月，前後 35 年都在交換處任職。



汪雁秋女士（右）與蔣復璁館長（左）互動剪影
資料來源：張培文提供

三、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汪雁秋女士：

開始到交換處工作時，蔣館長大概的告訴了我，李神父是位神職人員，他不大管這些行政工作，因此進交換處之初，未拆封的信有一百多封在書架上。花了 3 個月的時間把交換處的檔案整理起來。我沒學過檔案，只會以國家來分，美國就分在單獨的一個檔案中。館長覺得我做得還不錯，因為他在旁邊都有看到。蔣館長任內還有一批獅子會贈送的書、還有亞洲基金會贈送的書，從這裡我就瞭解圖書交換的性質，把它們都整理出來，花了 3 個多月才整理完成。



我初入職中央圖書館時是編輯，當時交換處可以說是具備獨立性質，任命不受編制的限制，只要資格符合了就可以擔任主任。交換處在大陸時期就有了，成立的時候就是要代表國家，主要依據布魯塞爾協定，規定每個國家必須成立一個這樣的單位，負責這個國家辦理有關出版品交換的事宜，所以布魯塞爾有兩個協定，一個協定是普通書，另一個是政府出版品。

那時候我們是向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德國國立柏林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幾個單位進行出版品交換，這幾個單位的出版品不需要經過選擇全部交換。日本做事很有規則，定期3、4大箱寄過來，不經過選擇，什麼都有，所以我們日韓文室成立起來時日本官書佔很大部分，相較之下，韓國的官書則不是很多，就當時出版品國際交換的性質而言，韓國也就是普通的交換而已。

1991年IFLA在莫斯科開會，我們就順道在那裡參觀。後來在臺灣舉辦了一個國際會議，邀請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出席參與，對方也回信亞洲部的主任會來臺灣，但是那時他們還不能結匯，結果他一下飛機看到我就說：「我一個錢都沒有！」我只好先墊給他一萬塊錢，因為他們禁止外匯，所以臨時沒有錢可以用。

說到沒有錢可以用，有一次會議是邀請印度來參加會議，印度與會貴賓在機場連出關後的錢都沒有，出不來，當時張鼎鍾跟我一起，就趕快準備錢將貴賓接出。我是比較敢擔當，比如說埃及來臺灣的貴賓，出入境要保證人我就去當保證人。當時外交部問：「妳是什麼人？」我說：「調查局不會把我抓去，但我不保證，他就進不來！」，所以那時候的國際會議都是交換處辦的，而各個國家與會貴賓的保證人則都是我。我在當館長秘書時，中央圖書館比較拮据，所以沒什麼

國際會議，等到我到交換處以後，開國際會議多的時候是王館長時期，楊館長也開得很多，一年開兩次。

四、參與國際書展

汪雁秋女士：

海外國際書展的參與早期並不是交換處的業務，而是圖書館閱覽組籌劃。蔣館長時期，閱覽組不派人去參加，只寄書過去，委託駐外單位來照應，教育部文教處辦理的在此更早之前，可是文教處只管業務不管書展，主要關注學術人員的交流。中央圖書館接辦國際書展業務後，閱覽組做了4、5年，因為交換處是辦國際業務的單位，所以蔣館長又將這個業務改由交換處來辦。蔣館長4年後離開央圖調至故宮，之後就由屈萬里先生來接任館長。屈館長是國學大師，他的想法是希望中央圖書館能成為一個漢學研究中心，所以他的著重點在收集各方面的漢學資料，那時就很少參加國際書展。屈館長之後就是包遵彭先生，包館長就很積極。當時閱覽組做的有中南美洲的，美國就是ALA、還有Stage Library，歐洲那時候沒有，到我來以後才有歐洲，比如說日內瓦書展、英國倫敦書展、多數的都是美國的。

我有一篇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報導，他們每年年會時都要舉辦書展，這個書展以前是一位出版界的人負責參與，那時錢復是駐外代表，他覺得你怎麼只有展出自己的出版品，沒有全國性、全臺灣性的出版品，所以他就發電報給中央圖書館說，新聞局問中央圖書館是否願意辦理？從那個時候起，中央圖書館就來承辦。我們參與國際書展時新聞局都很滿意，主要展的是文史哲、藝術、兒童，因為ALA有兒童圖書，但科技方面我們沒有太多的涉入。



所以每一次就先編一個書展的書目，有中英文對照，讓國外的承辦單位或讀者群都可以看到，第二個就是委託一個轉運公司，把這個書寄到國外的單位負責提取。王振鵠館長時，圖書館業務就開始活絡，那時的經費也多了，所以每一次都有派人去，我去參加過不少次，去時都會帶一位年輕同仁，等於讓他實習一樣，看看書展是怎麼辦的！而且書展後，將書贈送給美國一個學校，所有的書就不帶回來。當時中共沒有參展，他們看到我們的書在書展上很受歡迎，也開始委託美國一出版公司代理，但那個時候是毛主席這種書，所以引不起多少人有興趣，他們看到我們有贈送書刊給大學圖書館，也跟著贈送書刊，以後亞洲研究學會大陸也有書攤了。

亞洲研究學會年會分很多主題，也講臺灣問題，所以我們選書是看這一年有哪些主題，而且選出的書是當年的出版品，所以書攤一開，很多人都會跑來，李華偉館長等人都來了，那時現場不賣書，只接受訂單，因為書要送給學校圖書館的，因為現場賣書你要寄很多的複本，不知道哪一本書銷路如何？不是以賣書為主，所以還是先接受訂單。蔣館長開始覺得書展很重要，他認為這等於是一種文化外交，人家就知道臺灣有這麼多出版品，讓我們臺灣的文化提升！從你的出版品可以看到你的文化。還有可以幫東方部建立中文館藏。像加拿大的圖書館在成立時，我們就曾送書給他們。像國會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等十大圖書館，我們都送過，所以這個影響很大，有時他就依據這個做基礎來發展收藏，所以書展有這個好處與目的。

那時最多的時候是一年8個書展，但是到後來經費縮減我退休後，漸漸減少，現在好像只剩下一個亞洲研究學會。IFLA 我們沒有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名

義參加，而是用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的名義參加。因為覺得 IFLA 太政治化了，中共是 IFLA 理事國，為了參加 IFLA，我們的名字是一再的交涉，不得用 National，後面也不得加上 NCL，他說你中央圖書館就用 Central Library Taipei，後來交涉的結果，就用交換處的名字加入，當時交涉真的很困難，因為在蔣館長時期，跟大陸是封閉的。我是五〇年、六〇年代，我跟 IFLA 的秘書長交涉好多年，後來才同意，也經過外交部的同意，現在好像還是用此名稱。所以今後我想，新政府跟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冷淡，他們對我們加入或出席國際會議可能會受到一些阻攔，又可能會回到從前那個狀態，那個時候真得很困擾，王館長十二年國際關係和各方面都做得是最好的。

五、結語

汪雁秋女士一生閱歷豐富，學成歸國後在因緣際會下進入了中央圖書館服務，開始其長達近35年的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對汪女士一生的爬梳，不僅得以回顧我國近代社會動盪之下，人民流散與遷徙的時代悲歌，更是我國戰後圖書館對外事務發展之縮影。此次摘錄內容著重於汪女士學成歸國後與中央圖書館間的邂逅，及其於出版品國際交換、國際書展工作之回憶，惟每項主題所涉範圍與細節過廣，篇幅有限未能詳盡，俟後續相關資料的整理與出版時再行補充。（本文由汪雁秋女士口述；劉春銀訪問；彭慰、劉春銀、張培文編校）

誌謝：本文由汪雁秋女士長公子張培文、前國家圖書館彭慰主任、前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劉春銀主任協助校稿。